

## 【短 文】

# 字母拉丁化与土耳其的现代化

咎 涛

对土耳其人来说，2008年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事情：青年土耳其革命（1908）一百周年，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逝世七十周年，同时，或许更鲜为人知的是，今年也是奥斯曼-土耳其语实行拉丁化八十周年（1928）。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语言/文字是文化/文明的载体。改变一直以来使用的文字，就具有文化革命的意义。

11世纪以来，讲突厥语的民族开始在小亚细亚定居下来，从13世纪开始，他们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土耳其语言学家把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3-15世纪为古奥斯曼-土耳其语时期；15-19世纪为古典奥斯曼-土耳其语时期；19世纪中叶到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是新奥斯曼-土耳其语时期；1908年之后是现代土耳其语时期，1928年，土耳其共和国开始把传统阿拉伯字母进行拉丁化，就成为现代土耳其语发展的新起点。

“字母革命”发生在一个对现代化充满激情的年代。那个时候，把实证主义、启蒙理想奉为圭臬的国家精英们迫切地想使土耳其赶上西方的进步程度，他们恨不得让土耳其人一夜之间就能脱胎换骨，接受西方文明的科学与理性。在他们看来，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进行拼写的奥斯曼语（Osmanlıca）极其晦涩难懂，普及起来非常地艰难，既造成了大量的文盲，又严重阻碍了土耳其人向欧洲学习。也就是说，字母的拉丁化是与共和国追求西方化的历史任务密不可分的。

土耳其人属于世界上讲突厥语诸民族中的一支。他们大约从14世纪初开始建立起世界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官方语言即奥斯曼语，这一语言其实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但大量吸取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杂糅而成。鉴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伊斯兰文明中的巨大文化贡献，在奥斯曼语中，突厥语元素倒更像是外来语，显得不伦不类。奥斯曼语是一种严重脱离大众语的古文，只有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才能掌握，普通老百姓很难看懂，这样，掌握这门复杂的官方语言就成了统治精英的文化特权，并反过来强化了他们的特权。根据我个人有限的学习经历，我发现奥斯曼语的确很难学。而拉丁化了的土耳其语则更容易学习，也更容易通过自学来掌握。我的土耳其语老师曾告诉我说，若想学好奥斯曼语，我得先学习阿拉伯字母，然后还应该去学波斯语。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日益胜出，奥斯曼帝国曾打到维也纳城下的荣耀开始相对黯淡下去。来自西方的欧洲列强和来自北方的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形成了严重的挑战。在经过几次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精英逐渐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与西方抗衡并捍卫帝国的利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亲德反俄的奥斯曼帝国参加同盟国。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它不仅丧失了所有属国，而且土耳其本土也面临被英法等协约国瓜分的局面。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土耳其人民奋起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并取得独立革命的胜利。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布成立，凯末尔当选为总统。从此，土耳其结束了历时几百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统治，开始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在世界历史上，土耳其是较早赢得民族独立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非西方国家。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坚定的意志和强硬的手腕把土耳其推上了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培养了一代现代公民，使其事业后继有人，从此就没有给土耳其人留下可以走回头路的可能。凯末尔当政15年（1923-1938），他励精图治，革除旧俗，使土耳其人以欧洲文明为榜样，在伊斯兰教神权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世俗国家。在凯末尔的多项变革措施中，字母革命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

下面不妨简单回顾一下这一历史过程。

其实，自 19 世纪中叶的改革时代（坦齐麦特）以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就开始争论拼写（imla/yazım）和字母的问题。但由于得不到国家政权的支持，这些争论长期以来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1908 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在土耳其历史上亦称“第二次宪政革命”）之后，关于字母和拼写变革方面的争论进一步扩大影响，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勇气提出支持拉丁化。1912 年，杰拉尔·努里（Celal Nuri）就写道：“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的话，就必须争分夺秒地去研究拉丁字母……随着字母的革新，一个崭新的思想时代也将在我们面前开启。让我们对自己的语言、文学和字母来一场革命吧，让我们革新吧！”

土耳其独立战争胜利后，也就是 1923 年 2 月，在伊兹密尔召开了一次经济会议。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字母拉丁化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来自伊兹密尔的代表纳兹米（Nazmi）与他的两个朋友提出讨论采用拉丁字母的建议，但是，当时的大会主席卡泽姆·卡拉贝克尔帕夏（Kazım Karabekir Paşa）拒绝予以宣读。会后，卡泽姆·卡拉贝克尔在传达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不能接受拉丁字母，他还说：“……让我们还是不要自找麻烦了，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想法。不然，我们不就成了完完全全的聋哑（sağır ve dilsiz）人了吗？而且，在伊斯兰大家庭中，我们也将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卡泽姆·卡拉贝克尔的这个声明再次引起了关于字母和拼写问题的广泛争论。克勒赤扎德·哈克（Kılıçzade Hakkı）以“伊兹密尔大会上的拉丁字母”为题连写了三篇文章，来回应卡泽姆·卡拉贝克尔。1924 年 2 月，议员舒克律·萨拉奥卢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上又提出，“阿拉伯字母不适合土耳其语的书写”，他为采用拉丁字母辩护，使争论进一步扩大化。1926 年，在土耳其的《晚报》（Akşam）上，就字母拉丁化这个问题展开了一次读者调查。但结果是多数人表示反对改变字母。其中，支持接受拉丁字母的只有 3 个人。之后，又有学者就拉丁化这个问题撰写文章进行争论，表示支持与反对的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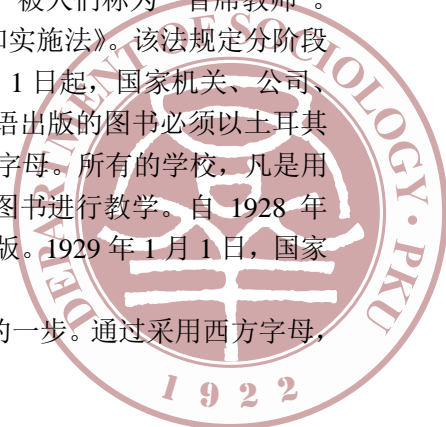
在争论不休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牢牢掌控国家机器的凯末尔党人。他们决意走欧洲化的道路，在字母拉丁化这个方面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当报刊杂志还在争论是否接受拉丁字母这个问题时，1928 年 6 月，凯末尔以其雷厉风行的惯常风格，命令成立一个“语言委员会”（Dil Encümeni），其目的就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来创制新的土耳其字母。在这个过程中，有语言学家对凯末尔说，从字母推出到普及可能需要至少需要五年时间，凯末尔闻听此言，十分不悦，下命令说：“要么就不做，要干就几个月把它干完。”结果，在很短时间里，委员会就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出了 29 个新字母。这个新系统的独特性是，每一个字母符号的发音是唯一的，学习起来非常容易。

历史上，土耳其字母革命开始的标志，是 1928 年 8 月 8 日晚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所作的一次讲话，他说：“朋友们，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美丽的语言，我们采用了新的字母。我们美丽、和谐与丰富的语言，将用新的土耳其字母来表达。数百年来，我们的头脑一直处于铁框框之中，我们必须把自己从那些难以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

在他的这个讲话之后，土耳其在全国境内掀起了学习新字母的运动。1928 年 8-9 月，凯末尔拿着小黑板，开始在全国旅行，随时随地鼓励和教授人们学习新字母，被人们称为“首席教师”。

1928 年 10 月 1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耳其字母采用和实施法》。该法规定分阶段地用新土耳其字母来取代旧的阿拉伯字母。法律规定，自 1929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机关、公司、银行、协会以及社团在其工作文件中必须要使用土耳其字母，土耳其语出版的图书必须以土耳其字母印刷。1929 年 6 月 1 日之后，向政府提交的各类申请不再接受旧字母。所有的学校，凡是用土耳其语教学的，必须使用土耳其字母，严禁使用阿拉伯字母出版的图书进行教学。自 1928 年 12 月 1 日开始，所有土耳其语的报纸与杂志也开始用新土耳其字母出版。1929 年 1 月 1 日，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公立学校发起了“读写运动”。

在土耳其共和国当局的改革中，字母拉丁化可以说是最具革命性的一步。通过采用西方字母，



它也表明了新生的共和国从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脱胎转型的坚定决心。对土耳其人来说，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所创制的新字母体系与土耳其语的结构更适合，而以前所采用的阿拉伯字母，在阅读和书写方面都非常困难，现在，这种难度则被大大降低了。因此，土耳其老百姓的识字率在短时期内大大得以提高，这对普及全民教育和民众学习现代学校知识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般地，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被认为是非西方社会学习西方进行转型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尽管对现代化可以有很多不同看法，尽管对现代性的多元特征可以有更多精彩的阐述，但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近代以来落后于欧洲的诸民族及其领导变革的精英们，基本上都是把现代化与西化（欧化）看作对等之物。在现代历史上，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变革明确提出要使民族发展达致“现代文明”之程度，在这里，现代文明就是欧洲文明。

对土耳其文字改革的作法也存在着批评意见。如当代学者甘阳先生曾强调指出：在土耳其全盘西化的改革中，最具魄力和影响力的是1928年土耳其的文字革命，它使后代实际上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献，“有从文化上彻底断根的效果。”土耳其的现代转变因此被甘先生称为“自宫式现代化道路”（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载《书城》，2004年2月），认为这对土耳其继承传统文化是不利的。

对于各种批评意见当然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站在土耳其改革者的立场看，他们强调的是：字母革命的确使土耳其人更容易接受欧洲文明了。土耳其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为现代化的国家，字母革命实是功不可没。

（作者： 晁涛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博士后）

**【编后语】**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语言和文字具有双重性：一是作为各民族传统的文化符号和记载历史成就的工具，具有文化载体的功能和意义；二是纯粹作为民族内部和各民族之间交流和学习的工具。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向世界各地的扩展和全球化进程，每个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为了有效地竞争就必须学习那些掌握了最先进科学技术、最领先思想理论的文明的语言和文字。有些文字书写困难、学习过程漫长，在这样的国际竞争中客观上使本民族处于不利的处境。

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必然存在一个劣势语言文字被淘汰的现象，这已经被语言学家们的调查统计所证实，也必然存在一些语言文字在字母、语法等方面进行变革的现象，这也被学者们在许多地区观察到。这些都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趋势。中国各民族也存在类似的语言和文字改革的问题。没有文字的人口较少的群体，是否需要为他们“创造”文字？在新疆一些民族曾经使用阿拉伯字母，解放后曾改用拉丁字母，文革后又改回使用阿拉伯字母。这两种字母在推动西北相关民族的现代化发展方面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可能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土耳其的字母改革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借鉴。

## 【征文】

热诚欢迎关心民族社会学研究的读者和研究生向本《通讯》提供文章，内容可以是有关民族研究的理论探讨，也可以是在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的调研报告，也可以是与民族问题有关的读书笔记，形式和字数不限，但希望能够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以及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投稿请发到：[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于长江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